

和谐生态:生态批评的正义诉求

张秀丽

(安徽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安徽 淮南 232001)

摘要 生态批评自出现以来作出了不少卓有成效的探索,但也遭遇了瓶颈。环境正义对广泛公正的诉求以及强大的实践精神为生态批评注入了新的活力。它探讨文学作品中的社会和历史叙事,发掘其深层的社会、文化和话语机制,为创建更加和谐的社会奠定基础。而中国传统文学的生态哲学思想将为审视环境问题提供重要思路和思想源泉,也为构建和谐的社会、人文和精神生态开拓路径。

关键词 和谐 环境正义 生态批评

中图分类号: I106.0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4970(2011)02-0088-03

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日益紧张促使全世界各方面环境意识的觉醒,公众对环境的认识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逐渐认识到生态系统自身所具有的内在价值,然而,环境恶化的趋势不仅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扭转,反而愈演愈烈。为什么旨在保护环境、减少环境灾害的种种努力没有多大成效呢?有着很深现实渊源的生态批评为什么在解决现实问题上步履维艰呢?本文从这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出发,旨在为当下环境问题的解决与和谐社会的创建提供理论支撑和现实观照。

一、生态批评的困境及环境正义的兴起

生态批评关注日益严峻的全球性生态危机,堪称文学研究中的绿色运动,因其深切的现实关怀,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美国兴起之后,短短20年间已经传播到世界很多国家,形成颇具影响力的全球性文学批评思潮。然而,从历史与现实的层面来看,这一时期的生态批评对生态危机根源的诊断并非完全击中要害,所开出的药方也未必十全十美,反而遭到了草根环境公正运动人士的质疑和挑战。与此同时,作为生态批评思想基础的生态中心主义哲学,尤其是其激进的一支深层生态学,受到了以有色人种、穷人为主体的弱势群体、第三世界以及环境哲学内部的严厉批判^[1]。正是在这种形势下,环境公正被引入生态批评学术活动中,生态批评也因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环境公正生态批评,也就是劳伦斯·布伊尔所指的**第二波生态批评**。

第一波生态批评对现代主义文化知识论和价值观念所作的批判具有重大意义,但不免偏激和自相矛盾,难以克服乌托邦姿态。在揭示生态中心主义的矛盾方面,布伊尔提出了这样一些值得深思的问题:

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解放要走多远?又以何种方式进行?扩展道德思考的外部界线,是应仅包括“高等”动物、一切有知觉的存在物、一切生命形式,还是达到此外的某个范围?道德分析的基础是实用论的,还是一种新康德式的“生命尊重”,还是一个民主广延主义的“自然权利”模式,还是一种估算“利益”的生态自由主义模式,或女性主义的“关怀”伦理学,抑或一种“管理”式新/后基督教伦理学?即使你做出积极的回应——比如对巴里的创世神学,即使你的知识关注之核心是这样的宣称:濒危物种与压制社会需求相关,仅仅依靠一个生态中心主义学说,你仍然难以顺利推行环境主义政治,甚至根本不可能做到^{[2]119}。

这些疑问都是当下生态批评面临的重要问题。人类不可能“像山一样思考”,生态中心主义的悖论便显而易见。当然,环境公正生态批评并非对第一波生态批评理论的简单抛弃,而是对其予以修正、深化和拓展,目的是通过环境公正的视角重新考察文学、文化甚至艺术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为生态危机的最终解决提供可能性方案。

在《阅读思维》一书中马克·特纳指出:“当代批评理论没有与整个人类世界相关联,甚至到了这样的程度,它对待文学中的物体的方式使得这些物体

收稿日期 2010-12-23

基金项目 安徽理工大学青年教师科学研究基金(31)

作者简介 张秀丽(1984—),女,河南漯河人,助教,硕士,从事英美文学与文化研究。

只有借助于理论才可见:在这种情况下,理论消失,物体也随着消失。^[3]特纳对文学的社会基础的关注应引起我们的注意。生态批评肇始于公众对核毁灭、失控的人口增长、荒野的消失、加速的物种灭绝以及日益恶化的空气、水和土地污染等的普遍关注,然而仅仅关注,或者以不干扰正常事务的方式解决危机远不能真正解决危机,反而会形成一种接受危机的习惯。正如许多环境公正主义者所倡导的,我们应行动起来,积极参与到环境政策的决定过程中去。不管环境问题解决与否,我们都必须针对问题做出重大的决定和重要的行动。

二、环境正义的批评视阈

文学研究应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倡导对社会发展有益的价值,生态批评作为一个本身极具社会实践意义的文学批评样式,更应从社会出发,服务于社会,挖掘文学文本中的环境正义思想对于更好地理解环境问题,以及寻找有效的解决途径有着重要的社会意义。生态批评视阈的社会正义转向重在探讨文学作品中的社会和历史叙事,发掘其具有的环境公正思想,或环境不公正端倪,这将为环境问题的最终解决提供可能性。

“环境正义”是一项迅速扩大的运动,兴起于1982年的“沃伦抗议”。它以抵制环境的种族主义,捍卫那些在经济和政治上处于劣势的群体(弱势种族、妇女等)的环境权利为宗旨,努力实现全球所有国家和地区在环境责任和生态利益上共同的、全面的和广泛的正义。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失调已经成为环境问题迅速扩散和日益加剧的重要原因。环境正义表明,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并不是抽象的孤立的,它与各种社会问题都是紧密相关的。生态危机产生的直接的现实的根源就是现实人类世界广泛存在的各种形式的环境剥削与压迫。因此,要真正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必须首先解放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环境正义运动的发展与传播,既对当代环境伦理的理论及其指导的西方主流环境保护实践提出了挑战,也为当代环境伦理提供了一个从现实的角度看待和分析环境问题的崭新视角^[4]。

文学批评中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当代文学研究中存在着过于注重形式、过于消解意义的偏颇,也有学院化、晦涩化和脱离现实的倾向。在各种危机竞相上演的当今社会,完全置身度外并非明智之举。从文学的社会和自然功用的角度来看,如果认可生态危机是当代乃至人类未来影响深远的危机,那么生态批评就应该对这种危机有一定程度的反映,甚至起抑制作用。其中最具实践意义的环境正义纬度

更应得到应有的关注和发展,也更能产生出对人类、对社会有意义的成果来。“拯救人类灵魂,改变其思想和价值观,正是生态文学出现的意义所在”。它对自然危机和人类信仰危机的关注,对产生危机的根源的探索,对解决危机的途径的探求,使其“成为当前建设和谐社会重要的文化源泉^[5]”。

1996年,美国著名文化学者斯文伯克茨撰文《只有上帝才能造一棵树:生态批评的喜与忧》指出“自然”与“环境”之间的区别,前者指原初的自然,而后者泛指周围的风光,不管是自然的,城市的,还是什么难以界定的,然而大多数生态批评家只关注原初的、未受科技改变的“自然”。他不无忧虑地说:“整个生态批评运动的纲领因此显得简单……有可能成为继续发展的障碍。^[6]布伊尔也认为“环境”更能概括研究对象的混杂性——一切“环境”实际上都融合了“自然的”与“建构的”元素;“环境”也更好地囊括了运动中形形色色的关注焦点,其种类不断增长,对大都市/或受污染的景观,还有环境平等问题的研究尤其越来越多——它们突破了早期生态批评对自然文学和着重提倡自然保护的环境主义文学的集中关注。^[2]事实上,生态批评的环境正义向度正是因为关注着包罗甚广的“环境”而具有更广泛的意义。

具体到文学实践中,生态批评的研究文本势必得以拓展。首先,生态批评不应也不该只探讨英语作品。环境问题本身是个全球化的问题,不是只有某个国家或地区的作家才有环境意识,即使是那些环境意识淡薄的地区,对其加以研究更能看出环境问题的可能症结所在。更何况,在文化多元的当今社会,单一就可能意味着停滞,任何一种文化都不能独自解决这一全球性的问题。只有充分吸收各国、各地区优秀的生态思想,并充分结合当下的社会实际,我们才能找到环境危机的可能出路。其次,生态批评应该关注那些不同种族、阶级、性别之间自然资源分配的文学想象。最后,生态批评不应排斥对自然界的纯想象性建构。目前生态批评关注的文本多是能够再现自然世界与经验世界的关联。这本身无可厚非,尤其是站在环境正义的立场上。但是我们同时也应注意那些纯想象的文学文本。这类文本虽然看似脱离社会现实,但是其所传达的深层生态哲学思想却不可忽视,因为生态批评的最终目的在某种程度上是改变人类狭隘的思维方式,是思想文化的变革。总之,在环境正义这个新纬度里,生态批评的研究视阈将得以更大拓展。

三、和谐生态的构造

中国的生态批评研究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中

期,我国学者最早以生态美学为题发表的论文是1994年李欣复的《论生态美学》与余正荣的《关于生态美的哲学思考》^①。此后,这一理论武器迅速走入我国学人的文学批评和创作实践中。学者如鲁枢元、王诺、曾繁仁等,立足中国国情与文化,对生态批评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意义深远。从中国期刊网的初步检索结果看,从1994年至2010年11月,国内研究中国传统生态思想的评论文章有37篇,包括14篇硕士学位论文,3篇博士论文。这些研究梳理和提炼出了东方的绿色思想及其哲学基础,充分论证了中国传统绿色思想和生态智慧在生态批评话语建构中的举足轻重的作用,为中国学者提供了一个立足本土资源,彰显自主思维的绝佳契机。但是在理论建构、学术实践、学术势头和学术规模等方面还有些欠缺,对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的阐释存在简单化倾向。通过引进国外最新学术成果,并与我国实践相结合,中国的生态批评才不会被淹没在生态文明的洪流中,也才能发挥其应有的学术批判锋芒和文化建构力量,进而为生态文明建设发挥应有的作用。

环境正义的发展将有利于和谐生态的建构,因为它要实现更深层的、更加全面和包容的人与环境的和谐相处。它要求对不同国家、阶级、种族、性别的资源分配进行探讨,并不断吸收各种优秀生态智慧。中国传统文学文化中闪烁着璀璨的生态智慧,能够承担起弥合西方思维方式所造成的缺陷与不足,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西方的思维方式及建造在其上的社会体制强化了对环境及弱势群体的掠夺,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源远流长,在当下重新挖掘这些文学作品的生态哲学思想将对整个生态批评的建构起着重大作用,不仅能够拓展批评空间,还起着质疑西方定见,彰显自主思维的重要作用。越来越多的生态思想和生态文化研究者认识到,发掘和引入古代东方生态智慧,很可能为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生态文学和生态批评找到新的思路⁷¹。

早在西方的生态学建立之前,中国人就有了对生态的认识。《周易》所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就是对上古生态观的概括。道家强调依时而生,所谓“道法自然”、“万物齐一”、“返璞归真”等就是这个道理。道家的生态伦理思想是建立在天人合一、物我一体的整体观之上的,是以道生万物、人天同源为其基本特征的。道家的这种生态和谐思想深刻地影响了后世文人的创作,魏晋玄学家、谢灵运等山水诗人,唐代的王维和孟浩然,宋代的苏东坡和辛弃疾,无不纵

情山水,大大拓展了中国伦理文化的精神空间。此外,美国生态批评的先驱——超验主义思想家和文学家爱默生和梭罗也深受道家的这种生态和谐思想的影响,一定程度上表明,中国优秀的本土文化在全球生态建构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佛教作为一个充满生命智慧和人文关怀的宗教,在其广博深远的思想体系中也含有系统的环境伦理观和生态意识。20世纪70年代,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尔德·汤因比在与日本宗教和文化界著名人士池田大作关于人类社会和当代世界问题的谈话记录(后被整理成《展望二十一世纪》)称孔孟学说和大乘佛法是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的两种重要方法。1988年,75位诺贝尔得奖主在巴黎发表了联合宣言,称人类在21世纪要继续生存就要汲取2000多年前孔子的智慧。通过发掘这些本土资源,我们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并实践生态思想。

正如《环境正义读本》中一位作者警示说,生态批评内部缺乏一个强大的环境正义成员,而这是个深刻的危机。因为,要把环境正义带入生态批评,仅靠几篇文章、几个会议是不够的。“必须有对这个领域整体进行一次根本性新思考和新行动,正如环境正义理论和实践正在引发一次对所有环境运动的根本性思考一样”^[2]。作为一种由环境问题催生的文学批评,生态批评必然要关注社会实践,朝着环境正义的向度发展。它的进一步发展将促使探讨各种文学作品与环境的对话,以及这些对话所产生的意义,这也将为创建更加和谐的社会奠定思想基础。

参考文献:

- [1] 格伦·A·洛夫. 实用生态批评:文学、生物学及环境[M]. 胡志红,王敬民,徐常勇,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3-4.
- [2] 劳伦斯·布伊尔. 环境批评的未来:环境危机与文学想象[M]. 刘蓓,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 [3] TURNER M. Reading minds :the study of English in the age of cognitive science [M]. Princeton , New Jersey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4.
- [4] 王韬洋.“环境正义”:当代环境伦理发展的现实趋甄[J]. 浙江学刊,200X(5):173-176.
- [5] 张晓琴,沈玲. 生态文学:构建和谐社会的文化源泉[J].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11(4):75-77.
- [6] BIRKERTS S. Only God can make a tree :the joys and sorrows of ecocriticism [J]. The Boston Book Review ,1996 :11-12.
- [7] 王诺. 生态批评:发展与渊源 [J]. 文艺研究 ,2002(3):48-55.

① 李欣复. 论生态美学 [J]. 南京社会科学 ,1994(12). 余正荣. 关于生态美的哲学思考 [J]. 自然辩证法研究 ,1994(8). 关于我国最早的生态批评研究,国内有不同看法。另一种较为普遍的说法是,中国的生态批评研究以1999年《外国文学评论》第4期发表的《文学的生态学批评》(司草)一文为开端。两种提法都有一定道理,前者侧重我国自身生态批评的发展线索,后者以引进国外理论为切入点。《文学的生态学批评》介绍了格洛特费尔蒂和弗洛姆主编的《生态学批评读本》、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的《新文学历史》(NLH)杂志1999年夏季号,以及利物浦大学教授乔纳森·贝特的著作《浪漫派的生态学》和《解读家乡的山》。